

吴地文化通史

李义林

编纂委员会主任：杨卫泽

主编：高燮初

副主编：唐茂松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吴地文化通史

李亚林



(下)

编纂委员会主任：杨卫泽

主 编：高燮初 副主编：唐茂松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地文化通史 / 高燮初 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

ISBN 7-5034-1769-2

I. 吴... II. 高... III. 吴文化 - 文化史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136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白庙 邮编: 101118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 字数: 1424.6 千字

印 数: 2000 套 插页: 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引 言

物质文化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总和,是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它直接反映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利用、改造及和谐共处的发展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吴地的物质文化,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基础,吴地绚丽多姿的精神文化,是建立在吴地丰富多样、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

吴地的物质文化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它涵盖了吴地人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我们在这一编中分立 15 章进行论述。即(1)稻作:民以食为天。水稻是吴地最基本、最具特色的农作物,吴地种植水稻的历史源远流长;该章同时还兼述麦和杂粮,历史上形成的稻麦二熟制是吴地最基本的农作物种植格局。(2)渔业:吴地河湖众多,养鱼等水产业发达,“饭稻羹鱼”是吴地人民最富特色的饮食文化。(3)蚕桑:种桑养蚕是吴地农民最重要的家庭副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丝绸业是吴地最负盛名的手工业。(4)茶、竹:吴地处江淮以南,茶、竹盛产于吴地,茶、竹文化绚丽多彩。(5)园林:吴地园林名闻全国,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富有江南特色。(6)水利:吴地河湖纵横,兴水除患有悠久历史,建有著名水利工程,出有众多水利专家。(7)舟、桥:在水乡泽国,舟、桥与吴地人民的出行密切相关,它把由水分隔的吴地连通起来,并提供便捷的交通工具。“南船北马”,舟桥文化也是吴地水乡特色的文化。(8)陶

瓷:吴地为陶瓷文化的发源地,它绚丽多姿,丰富并美化了人民的日常生活。(9)建筑:吴地建筑业发达,“西山邦”更负盛名,为吴地人民的“住”提供安居环境。(10)冶炼:吴地的青铜冶炼和冶铁业均达很高水平,反映着吴地先进的生产力。(11)工艺:富有吴地特色的苏绣、漆艺、扬州玉器、无锡泥人等工艺是一朵朵绽放在吴地百花园中的奇葩。(12)商业:吴地物产丰富、交通便捷,商业发达,农商文化是吴地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金融:吴地金融业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其中当铺、钱庄是吴地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银行则是近代由国外移植而发展起来的金融业。(14)乡镇:始于殷周盛于宋代。(15)城市:吴地农、工、商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城镇勃兴,发展迅速,并呈密集形分布,形成长三角经济带。

上述每一章内容,都力求阐述其发展状况、成就特色和蕴含的文化品位。综观吴地的物质文化,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显示出生产力的先进性。无论农业方面的稻作,还是手工业方面的丝织业、棉织业以及青铜冶铸业等,都反映出在当时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二是物质生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吴地地理位置适中,气候暖湿,阳光充足,加上平原、水域广阔,丘陵、低山点缀其中。农作物、经济作物、蔬菜、花卉、果木、河鲜、湖鲜、海鲜应有尽有,真是物华天宝。三是巧夺天工的创造性。吴地人民聪明、智慧、勤劳,心灵手巧,他们在充分利用、发掘自然资源,开发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种种产品过程中,表现出巧夺天工的创造性。如在陶瓷、冶炼、舟桥、园林、水利、工艺、竹木雕刻、煮茶、纺织等方面均表现出了这种非凡的创造精神。四是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科技文化上的交流。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清以来吴地商业的高度发展,吴地城镇的繁荣,特别在近代吴地开埠以后,作为从国外移植而来的金融业——银行,在吴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反映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十二章 稻 作

太湖流域的吴地,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饭稻羹鱼”,民勤本业,是我国最主要的稻作区之一。种植水稻,是吴地农业中的第一要务,据估计,在吴地农村,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稻田,可见其所占比重之大。

一地区的农业尤其是农艺作物栽培业,是该地区一切文化的基础。吴地是我国著名的稻区,水稻生产对吴地人民的生产方式、性格、爱好、艺术创作和民间信仰,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生产方式对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由于水稻生产在吴地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必然影响到稻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以说,水稻地区的民间文化大部分是属于稻作文化的。文化学上的所谓“稻作文化”,除了从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上研究水稻主体和它生产上有关的一些技术问题,以及它的起源、传播等之外,还包括由水稻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食、衣、住、行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的种种习俗,稻区人的生理特点、心理气质和文化心态等等。一句话,包括由水稻生产所派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吴地的稻作文化,是吴地全部文化的基础性文化。

稻作,最核心的是它的农艺问题,以及围绕稻作农艺的某些生产习俗。吴地稻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要从它的源头即吴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稻作写起,历经各朝各代,理清吴地稻作农艺的历史发展脉络,一直写到近世现代化的吴地稻作。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吴地稻作

吴地稻作农业起始极为古远,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已经发生。20 世纪后半时期考古学上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得以比较清晰地认识吴地先民的早期稻作状况。1954 年,在无锡仙蠡墩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见到成堆的稻壳,经测定,距今 4000 余年。这一重大发现,是吴地远古稻作文化被学术界公认的开端。此后数十年间,在吴地的考古发掘中,又陆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百处,其中稻作遗存多处。已经发现的远古时代吴地的稻作遗存,按年代远近排列,主要有:

桐乡县罗家角文化遗址稻作遗存:该遗址的第四、第三文化层,有粳稻、籼稻,籼多于粳;还在夹碳陶的胎壁中,夹杂着大量稻谷碎屑。据 C14 测定,距今约 7100 年。这是迄今发现的太湖流域年代最为久远的稻谷遗存。考古学界称它为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类型。

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稻作遗存:距今约 6000 年,遗址中除发现手制夹沙陶、泥质红陶和黑陶外,还发现了籼稻。马家浜文化类型中的一种比较进步的稻作遗存,是吴县的草鞋山遗址。此遗址位于太湖的东北、阳澄湖的西南,其第十文化层距今 6000 年,发现有结成团块的碳化稻谷,经鉴定,粳多于籼。同时,还发现当时加工稻谷的陶杵。同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稻作遗存的,还有常州圩墩遗址的稻谷,苏州越城遗址的稻谷等。

崧泽文化遗址稻作遗存:位于太湖以东、淀山湖畔的青浦县境内。此处发现稻谷、稻米和稻叶残叶,稻谷颖壳脉纹清晰,有的颖



尖都非常清楚,而且米粒完整,粳多于籼,经测定,距今5100年左右。崧泽文化是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一种过渡型文化,是连接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一些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的中、上层,覆盖着崧泽文化遗存物;而在一些良渚文化类型遗址的下层,也掩埋着崧泽文化遗存物。

良渚文化遗址稻作遗存:地属杭嘉湖平原的余杭良渚镇,发现有大量石制三角形犁形器,据考古分析,距今5000年至4000年,说明当时的稻作已由“耜耕”进入“犁耕”阶段。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范围已遍及太湖地区。太湖以南的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其第四文化层发现成堆的碳化稻谷和米,稻谷纵沟和残留其上的颖壳均清晰可辨;有一块粗厚的黑陶片上刻有好几粒稻谷印痕;还发现舂米用的陶臼。同属于良渚文化类型稻作遗存的,还有无锡仙蠡墩遗址的稻壳(粳稻);无锡锡山公园遗址,其下层一个灰坑中,发现不少稻谷凝块;无锡施墩遗址的稻谷;吴县摇城遗址一口新石器时代的古井中,清理出数十粒稻谷以及吴县澄湖遗址的稻谷;南京庙山遗址的稻谷痕迹(粳稻);吴江龙南遗址检验出水稻蛋白;上海马桥遗址第五文化层出土的泥质红陶器两件,其表面也发现有稻谷印痕等等。

综上所述,吴地已发掘的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已有七千余年(罗家角遗址),自那以后延绵不断。出土的稻谷,形状大小均与现在的稻谷相差不多。由此推断,吴地栽培稻的历史理应更为久远,至少可以上溯至一万年以前。

一万年以前,江南吴地的气候比当今温热和潮湿,和现在珠江流域的气候近似,这种气候最适宜野生稻的生长繁殖。吴地最早的栽培稻正是在当地史前野生稻的基础上,由先民们长期培育成功的。

从上述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和米粒,在外型上有籼、粳之分。年代愈早,籼的比例愈高;年代较晚,粳的比例增加。在吴地,由多年生野生稻驯化培育成人工栽培稻(籼型);再把籼稻培育成粳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得益于吴地的天、地、人“三才”。正如《吕氏春

秋·审时兴》所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所谓“天”，乃是吴地气候温暖，光热充足，雨量充沛；所谓“地”，乃是吴地土壤肥沃，地势低平，水资源多；而所谓“人”，那就是长期劳动生息在太湖流域得天独厚自然环境中所孕育成的勤劳、智慧的吴地先民。稻作需要吴地先民的勤勉、耐劳、灵巧、细腻的性格；吴地先民也喜爱上稻作生产的耕作方式，使他们得以摆脱长久以来依靠采集、渔猎为生的原始野蛮生活。

一万年左右以前，江南吴地还是森林密布，高亢处草木丛生，低洼处沼泽莽莽，存在着大片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生产方式简陋和耕作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吴地先民种植水稻的最早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这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先民们在低洼地上烧去杂草，引水种稻（直播），听凭水稻自然生长，从而得到一定的收获。

在距今 7000 余年的罗家角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刀、石镞、骨耜等农具。石斧、石刀，用来砍伐树木、开拓耕地；石镞、骨耜，则用来进行翻土。那时的原始农业，便脱离了只伐木焚林、不翻耕土地（所谓“砍倒烧光”）的“刀耕”阶段，而进入“耜耕”了。但是，在这遗址中，还不见有石镰、石铎等收获农具，那时收获稻穗，还是用手直接摘取或借用石刀割下。

新石器时代，人口稀少，土地刚刚零星开发，种植水稻的水田只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并不普遍。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出了 6000 年前的古稻田遗址多块，每块面积都不大，而灌水排涝的简易沟渠和蓄水坑（井）却已具备了。

当时稻作技术十分简单，整个生产过程只有种和收两个环节；中耕除草、施肥和灌溉等技术，只是处在萌芽状态。

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吴地稻作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在不少遗址中都发现了新的翻土工具石犁、石破土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这表明原始社会末期，吴地的农业，已从“耜耕”发展到“犁耕”阶段，稻作生产上对中耕除草工作重视起来，并已用专用工具进行收割。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产活动,兼搞捕鱼、打猎的一支农业部族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从吴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中层文化类型)的发掘情况来看,几乎所有发现稻谷遗存的地方,都同时发现了某些其他作物(如苧麻、豆类)的遗存和饲养家畜(如猪、水牛骨骼)的遗迹,越到后期,种植的作物越有所扩大,手工业也有所发展,说明在吴地,稻作业和饲养业等很早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节 历代吴人在稻作农艺上的文化创造

夏、商、周以降,江南吴地的稻作农业稳步发展。《周礼·职方氏》说:“东南曰扬州,……其渊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周代的“扬州”,包括淮河以南直至浙江、江西,而其中心地区恰为吴地。在古籍中,说到南方种稻的地方不少,《吕氏春秋》就盛赞“南海之稻”;《淮南子》则说,“荆、扬二地,其谷宜稻”。三千年前的周朝,吴地稻作布局的基本格局,已经大体形成了。周太伯、仲雍奔吴后,就带领人民从事稻作生产,种桑养蚕,同时带来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吴地稻作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太湖流域稻作生产有长足的进展。从出土的春秋吴国境内的农具的多样性、广泛性看,其时已有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稻作生产规模。《吴越春秋》记载,勾践十三年(前480),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稻谷“万石”,可知吴国余粮之丰,亦足见当时吴地水稻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吴王有多处储粮的巨型仓库,位于吴大城(今苏州)“胥门南三里”的“储城”,即为其之一。稻米丰裕,酿造业就发展起来,吴王的“酒醋城”即在“胥门西南三里”。吴地从战国时代起,逐步形成了以单家独户为基本单位的小型综合农业,一般农户往往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别样,并兼营小养殖业、小加工业等副业。

纵然如此,直到秦汉之际,江南吴地的耕作技术还相当粗放,“火耕水耨”的耕作方法,还在许多地方被沿用。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到过江南考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江南“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史记·平准书》也写道:“江南火耕水耨”。《汉书·地理志》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那么秦汉时代的“火耕水耨”,到底是怎样一种耕作方法呢?对此,东汉人应劭解释道:“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又,《沈氏疏证》云:“火耕者,刈稻了,烧其草以肥土,然后耨之”。可见秦汉时代江南的“火耕水耨”,是在稻田,非在荒地,是掌握了一定排灌技术,以水除草,并且使用相应的翻土工具的一种稻作技术,它已有异于上一节所述最早期的那种原始农业了。

尽管耕作方法有所改进,可是直到汉代初期,水稻栽培仍然采用直播方式。到汉代中期,才有了育秧和移栽的初步技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写道:“五月可别稻”。“别稻”就是移栽。在反复的实践中,稻农们体会到秧苗移栽的优越性,于是育秧移栽的方法就逐渐推广开来。东汉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龙骨水车(俗称“翻车”,动力有人踏、牛拉、风力几种,而结构大同小异)创造了,江南吴地开始使用这种新式戽水工具,不啻给水稻灌溉带来了福音,也给吴地水田劳作增添了一亮丽的风俗画。

“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在汉以后有所改变。三国时,东吴积极推广屯田,耕地面积大大扩大;在耕作技术上,有所谓“象耕鸟耘”。这是远古时代“鸟田”“象田”习俗的遗风。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利用水牛进行“踏耕”,叫它们在水田食草的同时,将草根踏入泥中,不但灭了草,踏实了泥,还因遗屎田中,增加了水田的肥力。南朝时,用犁耕田、用耨除草已经遍及江南。随着江南吴地的加速开发,稻作技术在进步。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尤其是太湖流域的河道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很大改善和发展,大运河的江南段(亦称江南运河)全线贯通,水田农具也作了重大的改革,稻作技术取得较大的进展。这



时期,由于江东曲辕犁、耙、碌碡、砺碛等一整套水田农具的创制,稻田耕作中的翻土、碎土、混和泥浆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耕作过程,稻田的耕作质量得到很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吴地稻作农业的发展。唐代,吴地可利用的土地大致都已逐步开垦成田。水稻的育秧移栽技术广泛推行,唐人有诗曰:“雨中移秧颜色鲜”。这是描写作者故乡吴中一带的情形。这时期太湖流域的水稻生产扶摇直上,三吴地区堪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唐代吴地产生了一些优质稻品种如红莲、香粳、稞粳等,香粳当时还是苏州、常州向京城的贡品。从唐代中期起,北方统治者越来越依赖南方的稻米供应。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诗人杜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通过沟通长江、淮河、汴河、黄河、洛河等河流的大运河,唐王朝的统治者将江南的稻米源源运到北方,实现了“南粮北调”。1972年在河南洛阳发掘出隋唐含嘉仓遗址,仓里有来自江苏苏州的糙米一万多石,这是出土铭砖上的记载,存仓时间是唐圣历二年(699)二月八日。含嘉仓是隋唐时大型粮仓之一,是一个漕粮转运站,由此可见那时北方统治者在江南吴地搜括到的稻米数量是不在少数的。同时亦证明唐代吴地稻作生产已经发展到颇高的水平。

宋元时期,适应人口增加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需要,吴地稻区农民着力耕作栽培技术的改革,从而形成了耕、耙、耖、耘、耨相结合的一整套耕作技术,奠定了水稻田精耕细作的技术基础。在水稻栽培管理方面,这一时期吴地农民发明创造了许多新的农艺,例如培育壮秧(“善其根苗”)、合理施肥(“用粪犹用药”)以及耘耨烤田(农人叫“搁田”)技术的进步等。在吴地,稻秧移栽十七八天后的初次中耕除草是耨稻。耨稻使用的农具“耘荡”(即后世所说的“耨”)是元代太湖地区稻农发明的。元人王桢所著《农书》写道:“耘荡,江浙间新制也。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约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簰其上以贯竹柄,柄长五尺余,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溷溷,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可见耨耙的创制,对于减轻中耕除草的劳动

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水稻生产精耕细作程度的显著进步,使宋时太湖流域水稻产量大大提高。故而时人艳称:“苏常熟,天下足”;或曰:“苏湖熟,天下足”。宋以前,太湖稻区是一年一度的水稻种植制度,稻田不种麦,麦子只在一些旱地种植。南宋时,北方南来的人数众多,南宋王朝提倡种麦,小麦从旱地发展到水田,形成稻麦两熟制,但水稻生产始终占着主要地位。宋时“占城稻”(原产于越南北部,后引入福建)传入江苏,对吴地早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明清时期,吴地人口迅速增加,耕地渐感不足,便想方设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进一步精细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例如重视深耕(“先用人耕,继用牛耕”,深达八九寸)、讲究施肥(“多下垫底”、“接力须相其时候”,即看苗施肥)以及精细管理(精耨细耘巧烤田)等,反映了明清时期吴地稻作栽培技术已经达到臻于完善的精细程度。长期以来,在世世代代稻农的选择和培育下,吴地水稻品种数以千计。在名目繁多的水稻品种中,有相当多的属于优质稻品种。据统计,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优良品种多达49个。明人黄省曾《理生玉镜稻品》(通称《稻品》)称,嘉靖年间苏州地区有38个好的水稻品种。在优质稻中,有大穗型的如“三穗千”“下马看”等;有芳香型的如“香梗”“红莲”“香子糯”“十里香”等;有柔软型的如“一亩馨”“瓜熟稻”“羊脂糯”“青秆糯”等;有洁白型的如“雪里拣”(即“太湖青”)、“晚白”“银条粳”“水晶糯”等;有宜粥型的如“薄十分”等;有滋补型的如“血糯”“鸭血糯”等;有宜于酿酒的如“金钗糯”“鹅脂糯”等。在太湖流域,粳稻日益取得主要地位,糯稻始终占有一定的比重。有些水稻品种,具有特殊性能,可以适应“因土种植”“因需种植”。如“观音柳”“丈水红”“深水莲”等品种,可在易涝的低田种植。“乌口稻”“谷色黑,秋初亦可蒔,以备潦余补种”,因它耐寒、耐迟栽,可供洪水年份水退后补种。一般农户常种些许特别早熟的品种以备青黄不接之需。稻农们对水稻品种的命名,颇为贴切、形象和饶有趣味,充分表现了民间的智慧,如:早熟稻中有“蝉鸣稻”“瓜熟稻”,中

熟稻中有“秋风糯”，是以自然界的物候、气候特征来命名的。有一种外形奇特的株型，“穗低而叶仰”，到了成熟期，粗粗一看，简直看不见稻穗，其实稻穗在叶下藏着呢，人们就叫它“雀不知”（即“早白稻”）。有一种密穗型的品种，穗头酷似辫子，人们叫它“辫穰稻”；有一种谷粒特大的品种，人们叫它“野猪哽”；有一种稻，“谷后有两翅”，人们就叫它“凤凰稻”；还有一种稻，其谷粒“傍有翅如蛇”，人们就叫它“狗蛇谷”。有“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饭皆香”的稻米，就命之曰“香子”“香粳”；有稻草特别柔韧，适于搓草绳、编草鞋的稻，人们就叫它们“麻筋粳”“草鞋筋”；等等。有趣的是，稻农在水稻抽穗后巡视田间时，如果偶尔发现一棵稻禾抽出两枝茎、结出两串穗的分枝稻（民间称其为“稻王”），便欣喜若狂。有时候，如果发现一串稻穗上有五粒稻谷成蜂窝状重叠在一起的，这就是“五谷王”，也视作祥瑞之兆。和分枝稻“稻王”极其难得一样，“五谷王”在稻田里也是十分罕见的。民间习俗，一旦发现“五谷王”和“稻王”，即带回家，用红纸包起来供在香案上，逢年过节祭拜，以祈求年年丰收。这种习俗，产生于何年何月，已难考证，但无疑在明清时期流行于吴地稻区。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进行统计后指出：从唐到明的一千年，太湖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大约增加了 391 斤（唐亩产 276 斤，明亩产 667 斤），提高了 1.4 倍。与各时期全国其他地区水稻平均产量相比较，太湖地区一直是名列前茅。究其原因，固然因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然而更主要的是人的努力，如注重兴修农田水利、提高土壤肥力、进行精耕细作、培育高产品种等。这些，就是吴地稻作农业发达的几项基本经验。

由于吴地稻作农业发达，而无锡适居太湖稻作区的中心和大运河沿岸。所以自明代起，无锡逐渐成为江苏产米各县的中心市场，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明清两代，吴地稻农已经比较自觉地重视对各种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动植物资源循环利用的一种生产模式。这种生产形式，最初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常

熟地区。据《常昭合志稿》记载,该邑东乡人谭晓、谭照兄弟进行多种经营,高田作围种稻,洼田掘池养鱼,塍上植果树,畦地种蔬菜,汙泽处种水生植物,池塘上架梁搭棚养鸡豕。凡是能够利用的土地和空间都利用起来了。因而收到了其田“岁入视平壤三倍”,其副业收入“视田之人又三倍”的良好经济效益。在动植物资源的循环利用方面,文中提到“池之上架以梁为笼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可见,这种循环利用是多方面的:稻麦的糠麸可以喂鸡豕,鸡豕的粪便既可作池鱼的饵料又可作稻田、菜地的肥料,鱼粪和池泥则可直接施于稻田和菜地……这种合理利用动植物资源互利关系的生产方法,俨然已是现代生态农业的雏形。这是吴地稻农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一种创造,也是田地久种不衰、越种越肥、水稻越种越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生产方法,明末清初在太湖下游的苏(州)松(江)地区和太湖南面的嘉(兴)湖(州)地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又具体发展为一种以水稻为主,蚕桑为辅,水稻、蚕桑、鱼畜有机结合,综合经营的新路子。对此,《沈氏农书》和《补农书》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如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即以豆饼、大麦、酒糟等养猪,以多余的桑叶饲羊;再以猪粪、羊粪作肥料肥田、肥地。养猪虽然“亏折身本”,但养一头猪能在6个月内积得15担猪粪,可作3亩稻田的肥料之用,所以民间有“养了三年无利猪,富了人家不得知”之说。《浦柳农咨》也说:“棚中猪多,囤中米多,是养猪乃种田之要务也。岂不以猪践(即‘猪谢’)壅田肥美,获利无穷”。揭示了“田养猪,猪养田”,稻与猪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说明当时农家养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以促进稻作生产的发展。

太湖流域很多地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稻作生产与蚕桑生产交叉,农谚云:“上半年靠蚕,下半年靠田”。而在长江南岸的某些沿江地区,实行稻棉轮作制,具有“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的效果,达到稻、棉双丰收,真所谓“花好稻好”。而且,稻作生产和种植其他作物的不少工具是可以通用的。

在水网地带,民间根据若干水生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不同要求,



因地因物,合理选种,“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产藕)”,相映交辉,各得益彰。

这样,自明至清,吴地的稻作业、蚕桑业、植棉业、家畜饲养业、淡水渔业等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使各类废弃物得到了充分辗转利用,化废为宝,以稻作为核心、综合经营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

第三节 稻麦两熟制和杂粮种植

吴地农民对水稻这长期为伴的“天生嘉禾”情有独钟,悉心栽培。然而,吴人也对其他谷物采取广为采纳的态度。这就在吴地逐步形成了稻麦两熟制和杂粮种植的生产格局。小麦和杂粮的种植,不仅突破了吴地稻作“单打一”的局面,而且对吴地稻作起到了众星拱月的作用。

一 吴地的稻麦两熟制

(一) 稻麦两熟制的形成

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 7000 年以前中国已经栽培小麦,但那是在北方地区。在 3000 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麦”(大、小麦等)已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至于长江以南,根据史书记载,约在公元 1 世纪,才有零星小麦种植。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小麦的栽培随着北人南下而逐步向南发展。第一步是向江淮地区推广。《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经过一百多年的生产实践,江淮之间的小麦栽培已有基础,于是开始了向江南地区扩展的第二步。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秋七月下诏:“扬州、浙江、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当时南方种麦,是在一些旱地,以济青黄不接,或水旱灾荒后的匮乏,对水稻生产起到了补助

作用。

唐代后期,江南山丘地区烧山而种的畚田日趋开发,小麦种植向江南的丘陵山地扩展。

宋代,小麦栽培在吴地有很大发展。北宋时,曾有诏令江南专种粳稻的地区多植诸谷,以防水旱为害。所谓“诸谷”,是指大、小麦和其他杂粮。这时,小麦种植就从旱地向稻茬田转移了。建炎至绍兴年间(1127~1162),由于北方南下移民人数激增,北人喜吃面食,致使麦价腾贵,这就进一步刺激了江南地区种麦。“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由于南宋王朝颁布的政策鼓励和有利于种麦,因而一般农民种麦的积极性大增。吴地农民充分利用空间,巧妙安排时间,做到农业结构合理,布局周密:稻茬麦田排水耕作,地得利用;麦茬稻田育秧移栽,时得安排,稻麦一年两熟种植获得成功。南宋乾道七年(1171)十月五日诏:“江东西、湖南北”,“广行种麦,并开具已种顷亩数目申尚书省”,“取旨赏罚”。于是,小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遍推广。江南吴地的稻麦两熟制正式形成。

明清时期,小麦栽培地区进一步扩展。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写道:种小麦者,“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小麦种植,在吴地的一些腹地也得到了深入推广。到清代,吴地凡种水稻之田,冬季大都种植小麦了。

(二)吴地特色小麦栽培技术的发展

吴地农民根据小麦耐旱怕涝的特性和本地气候、土质、水位等特点,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在稻田种植小麦的独特农艺。北方地区土质干松,雨量稀少,种麦多采用平地整畦耕作方法;与北方种麦以整地保墒和掘井灌溉为主不同,公元12世纪时,江南吴地初步形成了以排水防渍为主的小麦栽培技术体系,因符合吴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小麦生长发育规律,而获得了较好收成。